



求学清华

○ 陈肇元 (1952 届土木)



陈肇元
院士

1949年，我高中毕业时正值宁波解放。那时的宁波没有高校，想上大学的大部分同学都需要到国内高校各自设在上海的招生考点赴考。这样，我告别了宁波老家，辗转到上海、北京，最后成了北方人。但直到现在，改不了的仍是那石骨铁硬的宁波口音。步入老年后，忘不掉的也是童年时受日军轰炸和占领的恐惧与仇恨，以及抗战后在效实中学上学的四年住校生活和中学老师们的教诲。

那时不像现在有全国统考，江浙两省的考生都就近选择到上海考场参加考试。当时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铁路、海路中断，我只能乘坐破旧的长途汽车，遇到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地段时，就靠自己随身携带着的一根扁担，一头挑个箱子，另一头挑个包袱，下车步行。遇到国民党的飞

机轰炸还得设法躲避，晚上就在路边坐下熬过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好不容易到了上海的姑父家中。姑父在1947年就迁家到上海，住在陕西南路的一座四层洋房中。那时考上大学很容易，在上海，我考取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所大学，最后听取资助我上大学的姑父建议，选择了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家创办的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简称中纺）。因为按以往经验，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到纺织厂工作有保证，成绩好的能被保送到英国深造，而我是以最高分被录取的。

在中纺，为大学一年级学生教课的老师几乎都聘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名校的著名教授兼职，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学校在上海市中心，我在中纺上学是走读，中午吃碗阳春面果腹，每星期有三个傍晚作为家庭教师辅导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女孩功课赚点钱。

但是，我很快觉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纺织市场一片萧条，也因为当时姑父有笔从国外进货的生意，运货的轮船靠近上海港时，受到国民党军舰封锁，不能进港卸货，赔了一大笔钱，1951年他就离开上海到台湾经商去了。我自己也觉得不能再依靠亲戚的经济资助，想到国内总要搞工程建设，所以报考了清华大学在上海招收土木工程系的转学生。那时的国立大学不需要交学费和住宿费用，学生只需自己解决

□ 我与清华

伙食费。

就这样，我成为清华大学招进来的末代转学生。自此之后，国内大学之间再没有转学的了。至今我仍认为，高校之间应该允许学生通过考试或考核转系或者转学。刚上大学的学生，往往不甚明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究竟在哪里。

到清华大学那年，土木工程系招进了五个转学生，同时又有六个土木工程系学生转到校内的机械系等系。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许多著名老教授，当初考进清华大学当学生时，读的是航空、机械等系，甚至是文科院系，一年后才转到建筑系，毕业后有许多成为建筑名家和权威专家。当时的清华大学的名气在南方甚至比上海交通大学还大，大部分老师和学生也都是南方人。那时的大学都各自单独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报考的学生被录取后也不发给录取通知书，录取名单只在报上公布，看到被录取后，就可以去报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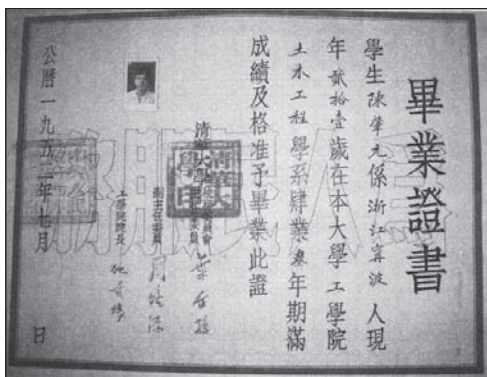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京，在南方人看来实在遥远。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需要两天两夜，过长江要下火车坐轮渡。到了北京站，就有清华大学的高年级同学在车站

门口热情接待。大家拥上卡车站着，一路颠簸到了郊外的清华园。车子进校园后，先到体育馆前的大操场绕场一圈，接受老同学欢迎，然后才下车进明斋的男生宿舍。新报到的土木工程系二年级转学生中，我和其他三个转学的同学同住在明斋的270号房间。

由于过惯了拥挤的南方江浙城市生活，我一到清华园就犹如到了美不胜收的世外桃源。清华的西校门外是一望无际的散落着的低矮的农舍，农舍的黄色夯土墙上涂有用白灰刷成的圆圈，据说是晚上有狼从周边荒废的圆明园出来时，见了白灰圆圈就会害怕，不敢靠近房子伤人。但校园内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包括西方学院式的系馆和大礼堂、体育馆，古色古香的工字厅皇家建筑与荷花池。偌大的美丽校园，在上海的高校中是见不到的。那时的大礼堂舞台正上方墙面嵌有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图徽，面对舞台的礼堂二楼墙面挂有“寿与国同”的横匾。没过多久，图徽中的八字校训没有了，改成了一个红色的五角星，那块在新中国成立后早该取消的横匾也就被撤掉了。

我在清华大学上学和工作过程中，从年长老师与职工身上，多能领会到这种奋发图强的自强意志和宽容待人的厚德精神。现在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训中尚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八个字，引自清华国学院陈寅恪先生为纪念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辞世的石碑上所铭刻的话，可是从无凭证为清华的校训，虽然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应该是大学培养人才的要旨所在。

从解放刚满一年的上海到了北京，就像到了另一个天地。我首先感到的是这里



陈肇元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

的政治气氛特别浓厚，又正好赶上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和“肃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学生们的热情非常高，一到星期天就上大街、下煤矿，搞宣传活动，接触广大群众。学生们个个都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有的教师则被怀疑成为“肃反”运动的对象。学生参军是自己报名的，班上有6个同学获得批准，大家敲锣打鼓欢送；参干则是党团组织委派的，没有人不同意，班上有4个同学就这样到地方上当政治干部去了。到了大二那年的寒假，全班同学到鞍钢现场进行测量实习。当时鞍钢的生产设备多被苏联拆下当作战利品搬走了，看上去是一片废墟。大家顶着刺骨寒风，爬到二三十米高的厂房上，测绘厂房结构的构件尺寸，以便为战后修复及重新生产提供资料。在随后的暑假里，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去了长春，在日本细菌工厂原址的大片土地上进行地形测量，为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地形图。频繁的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学们专心读书，但使他们接触了社会，培养了吃苦耐劳和爱国主义精神，建立了服从组织分配的理念，思想收获很大。在学校里，我是靠刻蜡版、印讲义的收入解决伙食费用的。

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按志愿被分成结构、水利、卫生、工程四个专业组，我选了结构组。土木工程中的所谓“结构”，就是房屋、桥梁等土木工程中以梁、板、墙、柱等各种承重构件相互连接起来的组合体，就如人的骨架，起着支撑整个工程并承受各种重量和力的作用。结构一旦倒了，整个房屋也就垮了。

清华大学的老师学识渊博，名气很大，但口才并非个个都好，有的讲课并不

清楚。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看到校、系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所以有的课程只是考前去听听，利用不去上课的时间到校、系图书馆自学。自学是我在中学就养成的习惯，大学生更要靠自觉，学校要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不能靠上课点名要学生上课。

1952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专业人才，政府决定全国高校的大三学生都要提前一年毕业参加工作，本来要学两年的专业课，最后只得匆匆忙忙压缩在一年内补齐学完专业课程。

毕业时大家热情高涨，抢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全班约50人，但最后分配留校工作的竟多达14人，其中绝大多数到从土木工程系分出去的新成立的水利系去了，留在土木工程系的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毕业分配时谁也想不到，班上这些满怀壮志、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有不少竟会在五年后的“反右”运动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惨遭劫难。

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行政领导中没有校长，我的毕业证书上署名的校领导是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副主任委员周培源，还有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炆。

（选自《陈肇元自传：我的土木工程科研生涯》，科学出版社，2016年7月）

